

投稿類別：史地類

「日治」與「日據」 政治力與歷史解釋的關係

作者：

戴毓倫。國立武陵高級中學。高二 8 班。

蔡侑廷。國立武陵高級中學。高二 16 班。

陳思穎。國立武陵高級中學。高二 20 班。

指導老師：

陳榮聲 老師

壹 前言

在滔滔不絕的歷史洪流中，跌宕著一段又一段的精采故事。不盡相同的認知，理所當然會產生不盡相同的見解。在討論臺灣史時，「日治」、「日據」用詞的爭議，即是參雜著多元的史觀和政治理解後而產生者。

一、研究動機：

前陣子，我們常在各大傳播媒體上看到有關歷史用詞的爭論，而其中最為人關注的議題便是：「日本統治過臺灣」，此一歷史事實該如何敘述？在我們曾使用過的歷史課本中，多以「日治時期」來概括。我們知道「日據」或「日治」都有人使用，但卻不曾疑惑其中差異為何。這次新聞爭議，讓我們重新思考，為什麼被我們認為是中性的學術用語竟帶有政治色彩？而這兩個用詞背後又是怎樣的歷史糾葛？

二、研究目的：

在本研究中，我們希望能從史料中挖掘蛛絲馬跡，嘗試找出民間和政府對這兩名詞的認知差異。藉由本次研究，我們將初步研究「名詞」和歷史見解之間的關聯性，探討其中的影響因素，並觀察政治對歷史解釋的影響。

三、研究方法：

黃英哲先生《「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一書中提及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的傳媒統制，讓我們聯想到新聞上的爭議。而周婉窈教授的文章「從「日治」到「日據」再到「日治」——一份公文所揭示的歷史事實」讓我們聚焦於公論報。我們並從《《公論報》言論目錄暨索引》呂婉如教授的論文《《公論報》與戰後初期台灣民主憲政之發展(1947~1961)》、羅雅如教授的論文《《公論報》「臺灣風土」副刊與戰後初期臺灣研究》和《臺灣報業演進四十年》得知《公論報》和「臺灣風土」的相關資訊，並考量以公論報為研究主體是否恰當。

因此，我們查閱了全期的《公論報》，自行統計、分析並比較「日治」和「日據」間的差異，以便得知政治對歷史解釋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貳 正文

一、《公論報》特點、臺灣風土 簡介

「公論報為戰後民營第一大報。」(羅雅如, 2008)而李萬居先生曾在我們的信念一文中提到他的辦報宗旨「不持一偏之見,只問事實的是非,以能對於地方與人民具有普遍的代表性為抱負。」(《公論報》第二版, 1959)「《公論報》是一九五〇年代台灣最具在野派色彩的報紙。」(薛化元, 2006)在國民黨刻意打壓之下, 1960年,爆發了《公論報》改組糾紛事件,並於1961年5月3日停刊。由以上可見,《公論報》是當時政治景況下,最具代表性的不受官方影響的民間聲音。也因此,我們將它做為本研究的主體脈絡。而其副刊臺灣風土,則在臺灣研究上占有一席之地。「陳奇祿在《聯合報》撰文將臺灣風土標誌為「最早從事臺灣研究的刊物」,明確指出臺灣風土的重要性。」(羅雅如, 2008)該副刊取材內容相當廣泛,包括了:臺灣民俗風情、史地資料記錄保存、民間信仰、原住民相關知識、人類學與民族學,而筆者陣容從尚未離臺的日本研究者到臺灣學者都有。綜合上述原因,臺灣風土無疑是重要的參考文獻。而本研究將以臺灣風土之文章為史料,針對其關於日本統治臺灣的用詞進行分析和統整。

二、改變歷史的一篇公文

根據周婉窈教授的文章從「日治」到「日據」再到「日治」一份公文所揭示的歷史事實,其中揭露了一篇1951年11月的省政府公文。(公文完整內容請見附圖一。)在這篇公文中,我們能清楚得知當時官方認為日治時期「有昧於日本過去對華之侵略行為,抑且易使臺省同胞泯滅其固有之國家民族意識,實有矯正之必要」。於是便發文《公論報》和《國語日報》「務希嗣後稱此時期為『日據時期』,以正視聽」。周婉窈教授在該篇文章中亦指出「『日據』不是研究者自發的用語,是官方『矯正』的用語」。我們不禁要問的是:有什麼資料能顯示出這篇公文造成的影響,而又怎麼知道學者使用詞語的意義?於是我們從《公論報》的副刊臺灣風土的統計資料中見到了其演變情景。

三、《公論報》副刊 臺灣風土 的數據分析

在閱讀完全期的 臺灣風土 後，我們匯整了下表 一

	日治 時代	日據 時代	日本 佔領 臺灣	日本 占據	日政 時代	稱日 本人 內地人	日本 統治	日本 帝國 主義下	臺灣 淪陷 異族
1948	0	0	0	0	0	0	2	0	0
1949	0	0	0	0	0	0	1	1	0
1950	8	1	1	1	1	1	1	1	0
1951	3	5	1	1	0	0	2	0	0
1952	0	5	0	0	0	0	0	0	0
1954	0	9	1	0	0	0	0	0	2
1955	0	0	1	0	0	0	0	0	0

附註：《公論報》副刊 臺灣風土 於 1952 年 5 月 16 日長期停刊至 1954 年 2 月，並於 1955 年 5 月 3 日止刊

（表一：《公論報》字自 1948~1955 年使用各種詞語描述日人的統計，期中報章資料來源請見附錄一）

本研究針對 臺灣風土 發刊期間內，學者發表之文章內容中，提及「日本統治過臺灣」此歷史事實者，分析其用詞的意義和數量，藉以推論出當時學界和民間對此事的看法，並探究 1951 年的那篇公文是否影響了學術創作的用詞。

從上表中我們可以得知以下資訊。首先，針對 1948-1949 年，雖然數據量不高，不過仍可看出「日本統治」和「日本帝國主義下」使用次數持平。可見學者對於日人並沒有特定的看法。再者，1950 年，也就是該公報發佈的前一年，是表達方式最多元的一年。我們可以看出使用「日治」的學者明顯佔多數，代表此一時期學者傾向於較中性詞語。而 1951 年，使用「日治」的學者減少，伴隨著是「日據」使用次數的提高。值得注意的是：1951 年使用「日治」一詞的三篇文章，分別出現在該年 1 月、6 月和 7 月。（請見附錄一日治部分。）顯示早在該公報發佈的 4 個月前，學者就已經停止使用「日治」一詞。1952 年之後就看不到使用「日治」的例子了。由於 1952 年中至 1954 年初 臺灣風土 停刊，我

們無從得之 1953 年的數據。到了 1954 年，更只有大量的「日據」和極排日的「臺灣淪陷異族」。

綜合上述資料，我們將大致分為三個階段來探討。首先，「無特定意識期」指從 1948 年-1951 年初期這段時間，「過渡期」則指從 1951 年前期-1952 年前期。「完全『矯正』期」即為 1952 年後期以後。

四、《公論報》副刊「臺灣風土」的文章分析

首先，對處於「無特定意識期」的學者而言，不同詞語只是文字形式的不同，並沒有特定的解釋及意涵。從此時期的文章內容來看，有些學者會在文章中繼續使用「日治」和「日據」。代表此時期的學者只是單純敘述歷史事實，而不認為相異詞語可能帶有不同史觀。再者是同一學者在相近時間內的不同文章中使用不盡相同立場的詞彙。例如楊雲萍先生在其 1950 年 8 月 14 日的「蔣雪谷先生紀念」一文中使用「日治」一詞並甚至使用「內地人」來稱呼日人，卻在 1951 年 1 月 26 日「滄海遺民王友竹」一文中使用「日人竊據臺灣」和「日據」。這可能代表的情況有兩種：其一如同上述所說，學者對不同詞語沒有不同的概念。其二是就事論事，並未受到民族主義的影響而一面倒。

另外，我們看到有些文章，前後文表達的意思，和所用詞語不完全相符。以馬導源先生在 1950 年 11 月 16 日的「臺灣采風錄」一文為例。「日治詐騙歌謠：『憲兵出門戴紅帽...』這首歌是日本人強佔臺灣後...以欺騙威嚇臺灣的。」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對日人的行為顯然是不認同的，但他卻仍使用日治這一現今看來較中性的詞語。可能的情況有兩種：一是日治只是平淡的敘述一歷史事實；另一則是同一詞語表達的意思可能是正面、也可能是負面，沒有固定的代表性。

綜合上述例證，我們可以推斷：1948-1951 年初期的學者，不論是彼此間或者是本人對某一用語都沒有固定的認知。

其次「過渡期」的學者對於「日治」或「日據」的敏感度大為提高，也對這兩個詞語有更多的考量和顧忌。

最明顯例子是：1951年4月20日，古翰村先生在其文章《竹塹風土小誌》中同時寫到「日據時代」和「日治時代（抗戰前）」。¹從此處我們可以看出，學者於本時期已經不是含糊籠統的在使用這兩個詞彙，而是意識到兩者之間不同之處。我們從《公論報言論目錄暨索引》中的公論報大事記及《「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 1945-1947》的資料推斷，1951年底的公報是一長串政策後的結果。¹古翰村先生寫這篇文章時，公報尚未發佈，但先前已有許多配套措施。作者可能因此得知政府希望學者使用「日據」而非「日治」，因此其中之一用「日據」。

但是對過渡期學者而言，這兩者之間的界線還不是一清二楚，因此作者仍使用了「日治」。卻可能是因為當時政治氛圍和政策指向，作者括號抗戰前以避免惹禍上身。

因此我們推斷：過渡期的學者，已經開始接受初步「矯正」，使用上並以「日據」為多數。但仍存在「日治」和「日據」使用上的疑惑。

第三個時期則是1952年後期以後，此時期的文章已鮮少見到「日治」，取而代之的是「日據」。有些原本在文章中使用「日治」的學者，已經將其用詞替換成較激烈的批判詞語。楊雲萍先生在1950年時大量使用「日治」，而進入1952年後期之後，他的文章多出現批判日人的詞。例如他在1954年的4篇文章中都使用「日據」。又或者1954年2月15日《莊雲從與臺灣》一文中，他便使用了「臺灣淪陷異族」的表達方式。

我們可以說，不論從文章內容或單一學者的角度看，1951年11月的那篇公文的确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而政治的确影響了歷史解釋。

參 結 論

「臺灣進入『中國』化的同時，臺灣人亦需隨之『中國人』化。」（黃英哲，2007）1945年，臺灣光復，普天同慶後即面臨語言、文化及思想上的差異。如

¹ 在尋找資料的過程中，我們也發現有趣的一點：其實政府本身的用語並未一致轉換。例如1951年11月27日，臺灣省教育廳代電：日治時代所存學生漫畫希轉飾普遍清查焚燬。

何讓接收的人民國民化，成了政府的首要任務。為了「再中國化」本島人民，中華民國政府實施了一連串的政策，其目的不外乎：「把過去受日人欺騙宣傳所引起對祖國的一切不正確的觀念，逐漸廓清。」(夏濤聲，1945)依據1946年公佈的「臺灣行政長官公署訓令」，一切凡是涉及炫耀日本武力、宣揚皇民化者，都應予以查禁。時間推移到了1951年，當局甚至直接發函報紙：應用「日據」取代「日治」。

「我對於臺灣人學習國語的問題，認為不是一個單純的語言訓練，卻已牽連到文化和思路的問題。」(魏建功，1946)根據上述及本研究結果，我們認為「日治」和「日據」的使用限制即是在「矯正」臺灣學者的思路。而從1948~1955的《公論報》副刊「臺灣風土」中，我們看到了上述政治力所造成明顯的轉變。藉由統計數據和文章內容，我們大致將其分為三個階段，即正文中提及的：「無特定意識期」、「過渡期」和「完全矯正期」。但是，階段和階段間卻找不出明確分界日期。我們想，就算是加了政治影響的歷史敘述，也是慢慢演變的，時間推移，不知不覺就是另一種觀念和想法。學者從一開始使用「日治」為多數，到之後摻雜一起，到最後「日據」霸權，從有意識到無意識，看似中立的詞彙就這麼被政策漸漸扭轉。

回到研究動機的問題：為什麼我們認為是中性學術用詞的詞語會帶有政治意涵？經過本次研究，我們認為：中性詞語也許本身是中性的，但是經過歷史的迂迴曲折和政治的縱橫捭闔，他就不再是中性詞語了，而產生了特定意義。在這場爭議中，各方皆提出不同看法，但根據研究結果，我們證明：在歷史解釋的變遷中，政治力量的確影響甚鉅。

肆 引註資料

黃英哲(2007)《「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麥田文化。

陳國祥、祝萍(1987)《臺灣報業演進四十年》。臺北：自立晚報。

薛化元(主編)(2006)《公論報》言論目錄暨索引。臺北：文景。

羅雅如(2008)《公論報》「臺灣風土」副刊與戰後初期臺灣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呂婉如(2001)《公論報》與戰後初期台灣民主憲政之發展(1947~1961)》。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論文。

臺灣省政府公報（1951）。為日據臺灣五十年光復後俗稱「日治時期」有矯正必要應稱為「日據時期」特電轉請查照。台灣省：台灣省政府。

周婉窈（2012）。從「日治」到「日據」再到「日治」——公文所揭示的歷史事實。台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2013年9月15日瀏覽，取自
<http://tw.myblog.yahoo.com/jw!uduCo2SGHRYWlZLEAu0T/article?mid=1320>

附錄一：表一 中統計數據的資料來源（各組中，排列依時間先後順序，若同天則以作者姓氏筆劃多者先排）

日治時代：

1. 楊雲萍（1950）。架藏有關（芝山巖）資料 - (14)臺灣教育沿革誌(刊本)。公論報，五月十五號，第五版。
2. 楊雲萍（1950）。架藏有關（芝山巖）資料 - (18)臺北市第三高等女學校開校三十週年紀念誌。公論報，五月二十九號，第五版。
3. 林衡道（1950）。祖師廟。公論報，六月十九號，第五版。
4. 林衡道（1950）。臺北的城隍外一篇。公論報，七月十號，第五版。
5. 楊雲萍（1950）。蔣雪谷先生紀念。公論報，八月十四號，第四版。
6. 張松（1950）。山地同胞種族的由來。公論報，九月四號，第四版。
7. 林衡道（1950）。基隆河沿岸的名勝古蹟。公論報，十一月十三號，第四版。
8. 林衡道（1950）。台北林祖厝。公論報，十一月二十七號，第四版。
9. 林衡道（1951）。艋舺青山宮。公論報，一月二號，第六版。
10. 林衡道（1951）。幼春詩鈔。公論報，六月十九號，第六版。
11. 藍紅（1951）。彰化二勝。公論報，七月三十號，第六版。

日據時代：

1. 古翰村（1950）。萬華風土小誌。公論報，十一月六號，第四版。
2. 楊雲萍（1951）。滄海遺民王友竹。公論報，一月二十六號，第六版。
3. 謝金選（1951）。江頭站名的來歷。公論報，十月十九號，第六版。
4. 方豪（1951）。台北及台灣全省地震小史。公論報，十一月二號，第六版。
5. 宋文薰（1951）。淹滅中的台北史前遺址。公論報，十二月十四號，第六版。
6. 宋燁（1951）。戰後台灣歷史史學與民族學界 - 以中國內地來臺學者的活動為主。公論報，十二月二十八號，第六版。

7. 宋燁 (1952)。發掘片斷。公論報，二月二十二號，第六版。
8. 曾志固 (1952)。新教傳入台灣北部。公論報，二月二十二號，第六版。
9. 呂訴上 (1952)。談台灣皮猴戲。公論報，三月七號，第六版。
10. 林衡道 (1952)。大科嵌溪名勝土俗採訪記。公論報，四月五號，第六版。
11. 言午 (1952)。臺灣八景。公論報，五月二號，第六版。
12. 岳全 (1954)。同胄志曹族篇—析述一本民族誌的問世。公論報，二月十五號，第六版。
13. 宋文薰 (1954)。發掘圓山貝塚的意義。公論報，三月九號，第六版。
14. 陳奇祿 (1954)。文化史蹟的調查和保護。公論報，三月九號，第六版。
15. 朱鋒 (1954)。古碑拾遺 四 一田仔廊埤圳碑記。公論報，六月二十一號，第六版。
16. 楊雲萍 (1954)。「士林溫古誌」與「士林街要覽」。公論報，六月二十一號，第六版。
17. 楊雲萍 (1954)。「士林溫古誌」與「士林街要覽」續完。公論報，七月五號，第六版。
18. 楊雲萍 (1954)。士林地方開發及其他。公論報，九月十三號，第六版。
19. 南人 (1954)。「新文學新劇運動專號」和「南投文獻叢集一」內容介紹。公論報，九月三十號，第六版。
20. 楊雲萍 (1954)。「南嘉雲地區歷史文化展覽會」及其他。公論報，十二月六號，第六版。

日本佔領台灣：

1. 方豪 (1950)。關於延平王遺像。公論報，十月九號，第四版。
2. 宋燁 (1952)。發掘片斷。公論報，二月二十二號，第六版。
3. 馬森 (1954)。台灣五大都市設置及定名之經過(續完)。公論報，七月五號，第六版。
4. 宮本延人 (1955)。日本人之臺灣民族學研究。公論報，一月三號，第四版。

日本佔據：

1. 言午 (1950)。靜樓詩抄像。公論報，八月十四號，第四版。
2. 方豪 (1951)。恆春縣清丈圖冊與恆春縣志。公論報，十二月二十八號，第六版。

日政時代：

1. 王鴻博 (1950)。布農族東埔社採訪二則。公論報，八月七號，第六版。

稱日本人(內地人):

1. 楊雲萍(1950)。蔣雪谷先生紀念。公論報,九月十一號,第四版。

日本統治:

1. 楊雲萍(1948)。深夜錄。公論報,五月十八號,第四版。
2. 楊雲萍(1948)。史家連雅堂。公論報,六月二十九號,第四版。
3. 楊雲萍(1949)。一日人的(遺稿集)。公論報,七月十七號,第五版。
4. 方豪(1950)。台灣民間史料的保存。公論報,九月十八號,第四版。
5. 朱鋒(1951)。安平迎媽祖。公論報,三月二十三號,第六版。
6. 陳奇祿(1951)。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有關高山族出版物內容舉要。公論報,七月二十七號,第六版。

日本帝國主義下:

1. 連溫卿(1949)。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土地收奪的過程(一)。公論報,一月十號,第六版。
2. 楊雲萍(1950)。關於劉銘傳的資料與其他(續)。公論報,二月十七號,第六版。

台灣淪陷異族:

1. 楊雲萍(1954)。陸隴其與台灣。公論報,二月一號,第六版。
2. 楊雲萍(1954)。詩人莊雲從。公論報,二月十五號,第六版。

附圖一:《臺灣省政府公報》一九五一年冬字第四十一期的新聞處公文(右上角)

